

西藏“流亡政府”的国际生存空间策略*

曾晓阳, 茅 维

(大理学院 文学院, 云南 大理 671003)

摘要:作为一个没有获得任何国家正式承认的非政治实体的流亡势力,从 1959 年流亡印度以来,西藏“流亡政府”为争取国际生存空间,就处心积虑地以各种手段积极活动,显示其国际存在。制定针对“藏独”势力对策的一个必要前提是,要充分认识“藏独”分裂势力的各种国际生存策略。

关键词:西藏“流亡政府”;国际生存空间;策略

中图分类号:D651.9;D60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1.019

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世界目光聚集北京之际,达赖喇嘛访问了日本,并在记者会上公然将我国钓鱼岛称作日方命名的“尖阁列岛”。此举再次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愤慨。达赖喇嘛想借此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和平人士”的形象,提升个人影响力;而日本右翼也企图借达赖喇嘛的访问,赢得它在领土争端上的舆论支持。

达赖喇嘛的上述举动就是其整套国际生存策略的表现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深知,作为一个非国家实体的流亡政治势力,要在国际舞台上生存下去,“如果没有一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一天也混不下去”^[1]。因此,我们看到,从 1959 年流亡印度以来,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谋求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争取国际生存空间,显示其国际存在。综而观之,其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策略有以下几种:

其一,竭力经营与印度的关系。

从本质上而言,政治流亡者与所在侨居国的关系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侨居国以提供庇护所的方式置换其所需的某些政治、经济、军事或道义等方面的利益。由于地缘政治与宗教的原因,印度成为达赖喇嘛的最佳政治庇护所。在这次利益交换中,印度不仅扮演了佛教“护法者”的角色,赢得了宗教道义上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在与中国的博弈中,有可能在中印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或缓冲国,从而减少了来自印度北方的不确定性;而

西藏分裂势力在这次利益交换中则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寄人篱下的达赖喇嘛深知,自己只是印方对华战略的一个棋子,要想在印度长期生存下去,必须紧跟印度的步伐,为印方谋取各种可能的利益。由此,我们看到出生于中国青海的他多次自称是“印度之子”,“我一直靠着印度的食物生存着,而印度的自治给了我巨大的机会。由于这些原因,我将自己视为‘印度之子’。外形上,我是一名藏人,而从精神上,我是一名印度人”^{[2]128-129}。他还前往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地区(我国藏南地区,印方称“阿鲁纳恰尔邦”)活动,宣称该地在战前属于印度,是被解放军以武力夺取的。熟悉西藏历史的人都清楚,1914 年由英印当局与西藏分裂势力合谋划定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方占领了我藏南地区,中国政府从未承认此非法的边界线。实际上,在 1959 年前,达赖喇嘛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此地归属印方,而且藏南地区的达旺正是六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达赖喇嘛出卖祖国领土无异于把他自家的祖宗都卖给印方了^{[2]128-129}。

其二,频繁访问外国政要。

从 1959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西藏流亡分裂势力一直不为世人所知。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波折为流亡势力的分裂活动提供了难得的良机,达赖喇嘛也渐为国际社会所注意。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他频繁活动于国际舞台,踪迹遍布几十个国家,已

收稿日期:2013-07-22

作者简介:曾晓阳(1975—),男,江西省赣州市人,云南大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涉藏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项目(13XJC850004)

历练成了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在2011年宣布“退休”后,发誓“这辈子不再涉足政治,一生追随佛陀”的他,政治热情却愈发高涨,带着一帮新老“重臣”访问了10余个国家。他在这些活动中每每以宗教人士的身份出现,从而给外国政要创造了打“擦边球”的机会,这些政要往往以接见宗教人士的名义避开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而达赖喇嘛也为自身积累下了许多“国际政治资本”。

其三,在联合国制造涉藏反华人权议案。

从1959年9月起,达赖喇嘛连续三年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联合国干预发生在西藏的“违反人道的犯罪行为”。此后,在某些西方大国的指使或操纵下,联大多次通过了所谓的“涉藏问题决议”。此外,他们利用联合国召开人权会议之机,展开“走廊外交”,向各国代表散发大量反华材料,并在会场外雇佣人员抗议示威,制造声势,向与会代表施压。这些政治公关运动推动了涉藏问题的国际化,在国际上制造出对中国的道德义愤,并通过这种道德义愤打压中国。客观而言,这一系列的国际政治公关的确对我国的外交与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西方的许多普通民众看来,西藏是个“被剥夺的弱势边缘群体”。

其四,假和谈,真独立。

从1979年至2010年,中央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的正式接谈已有十次。“流亡政府”先后抛出了“五点计划”、“七点建议”、“全体藏人高度自治的备忘录”作为对话的基础,始终坚持独立或半独立、变相独立,缺乏基本的诚意,利用接谈搞分裂,欺骗国际舆论。在受到中央的批评教育后,达赖喇嘛方面中止了和中央的接谈,在国际上制造出中央拒绝接触的假象。2011年,达赖喇嘛宣布“退休”后,“首席噶伦”洛桑孙根宣称希望重启对话,并由他负责的“政府”派出代表进行商谈。明眼人很清楚,此举意在提升“谈判级别”,即由达赖的私人代表上升为“政府代表”。

其五,与其它分裂势力合谋,建立“统一战线”。

证据显示,“流亡政府”已经与“疆独”势力、海外“民运”分子建立了联系,并且还在蒙古国与我内蒙地区利用当地藏传佛教的群众基础,积极进行活动并施加影响。在2005年11月30日,达赖喇嘛第一次会见热比娅时,就声称“西藏人民与维吾尔人民、蒙古人民还将继续度过艰难的时代”。此后,他又多次宣称包括台独在内的他们这些分裂势力“具有不可剥夺的独立权利”、“西藏和新疆

的问题相同,其根源是没有受到邀请的客人带着武器入侵”^{[2]131-133}。“藏独”势力不仅与“疆独”分子沆瀣一气,他们还与海外“民运”分子合谋,掀起反华逆流。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策划动乱的“民运”分子,始终没有放弃“回国掌权”的妄念。他们在海外上窜下跳了20多年,成立了四五十个组织,却日趋末落。少数有投机眼光的动乱分子把目光转向了达赖喇嘛,他们意识到,“只有达赖喇嘛才有魅力和权威整合中国海外民运力量”,有的“民运”分子甚至还把达赖喇嘛尊奉为“民运精神领袖”。由此我们看到,自2008年“3·14”暴乱以来,双方进入了“蜜月期”,在2009年的“藏汉大会”上,双方讨论了“西藏前途、中国民主化等重大议题”^{[2]112-115}。

其六,利用“藏独”激进组织制造事端,吸引国际社会关注。

以“藏青会”为首的激进组织,每年总要选择一些敏感时机制造事端,通过给中央政府制造麻烦换取西方的各种支持,以吸引国际舆论,显示其“国际存在”。1987年到1989年的拉萨骚乱、2008年的“3·14”事件、“绑架”北京奥运会、冲击我驻外使领馆等,就是他们的“得意之作”。2011年达赖喇嘛宣布“退休”后,“流亡政府”的派系权力之争日趋激烈,为了博取达赖喇嘛的青睐,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藏独”分子“期盼将出现更多流血事件”,2012年初,他们蓄意制造了几起打砸抢和自焚事件。2011年以来,在“藏独”分子的鼓动下,我国有的省份的藏区极个别地方发生了几起僧人自焚的事件,当地政府进行了妥善处理。西藏分裂势力对此大肆利用,事件后的短短几十分钟内,现场图片和自焚者生前的个人资料即出现于境外媒体,同时开展抗议绝食活动进行声援,并且肆意歪曲佛教关于自杀、教人自杀都是大恶的教义,宣称自焚不仅没有违背戒律,而且是“菩萨行”,给自焚者以“斗士的荣誉”,甚至煽动更多的人“为西藏而献身”,还给自焚者的家属开出了空头支票:大额的抚慰金、优先照顾家属偷渡出境“拜见”达赖喇嘛。对此极端的自焚行径,学者益多一针见血地指出^{[2]226},其意图无非有三:一是扰乱藏区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二是在各国重视对华关系的时代背景下,防止涉藏问题在国际上被边缘化;三是以压促谈,迫使中央对其分裂活动让步。这种以牺牲同胞为代价给中央施压的行径,恰恰是分裂势力虚弱和无奈的表现。

其七,以国际涉藏非政府组织为后援,扩大国

际影响。

涉藏问题之所以有今天的国际关注度,其与大量的国际涉藏非政府组织不遗余力地推动是密不可分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往往与西藏“流亡政府”唱双簧,并与国际上其它反华反共势力遥相呼应,攻击中国的西藏政策,给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耗散了我们的外交资源,造成了西方对西藏的普遍误读^[3]。西方反华势力借助涉藏非政府组织这个砝码频繁向北京施压,至少有两方面的战略考量:一是以涉藏问题打压中国,使北京在外交上陷于被动,抹黑中国形象;二是由于西藏接近中东、印度洋与中亚,而这些地方是世界的地缘政治中心和能源中心,因此,涉藏问题成了西方阻遏中国力量向这些地方延伸的一张牌。“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像西藏这样的政治屏障”,能够更好地控制世界能源和地缘中心^[4]。涉藏非政府组织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战略棋局中,起着分裂中国以及阻遏中国和平崛起的作用。这些涉藏非政府组织的反华活动,成为西藏分裂分子重要的国际后援力量。

其八,在西方媒体上不断发表反华言论,混淆视听。

当今世界,人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尊重人权成为政府在其人民和国际社会面前具有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一部分。媒体对侵犯人权的报道会使一个政府在公众和其他政府面前受到羞辱并缺少合法性。在这一点上,‘媒体是人权运动的可靠盟友’”^[5]。西方许多媒体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涉藏问题上与藏独势力达成了合谋。“流亡政府”协同涉藏非政府组织在西方做了大量的公关工作,吸引了媒体持续的关注,并取得了相当的话语权。它们经常借助世界媒体和其自办媒体,散布所谓的西藏“宗教压迫”、“人权迫害”、“民族同化”、“生态危机”等没有根据的谬论。议程设置与“沉默的螺旋”理论揭示,媒体有选择性地设置议程,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外在世界的判断,从而形成某些共识;民众为了使自己的意见融入主流,而成为“沉默的螺旋”。诸多研究表明,西方许多媒体存在“妖魔化中国”的倾向,尤其是在人权、民主、宗教、生态等问题上,许多歪曲、失实、以偏概全的报道,严重歪曲了中国的形象,而许多西方民众对中国的有限知识往往严重依赖于媒体,从而造成对华的普遍误读。

其九,利用讲经弘法,争取民心。

达赖喇嘛利用西方社会的宗教心理与宗教体验,开展讲经弘法活动,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其中不乏社会名流。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后,藏传佛教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宗教,从1989到1997年的短短8年间,美国的佛教教学机构从429个猛增至1062个。达赖喇嘛弘法活动的受关注度甚至超过了许多明星演出。“世界和平时轮弘法大会”的参与者达25万人^[6]。1988年后的10年间,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佛教机构从429个增至1062个^[7]。美国藏传佛教的信徒分布于各个阶层,从普通民众到社会名流,从好莱坞明星到政界要人。例如,支持“流亡政府”的一个重要非政府组织——“国际西藏运动”,其主席李察·基尔(好莱坞影星)就是达赖喇嘛的忠实追随者,据说基尔已于2011年闭关修炼。他控制的基金会是“国际西藏运动”的重要财源^[3]。达赖喇嘛的另一铁杆信徒——美国国会资深议员佩洛西,不遗余力地支持涉藏问题进入国会议程,并多次在国会成功通过了涉藏法案。佩洛西的助手与许多涉藏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保持着紧密的工作关系。在他们的努力下,“西藏得到了国会跨党派的普遍支持,议员及其助理们,尤其是助理同达赖的追随者一起工作,他们共同牢牢吸引住了历届美国政府和世界各关注‘西藏问题’的团体的注意力。他们的努力证明是相当成功的。这一遥远的雪山和它超凡的领袖今天获得在美国和世界各国在声援和行动中独特的位置,确保了西藏始终作为一个问题超越冷战而成立”^[8]。

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下,藏传佛教的这种群众基础是任何政治人物不可忽视的民意。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达赖喇嘛能够屡次在西方国会作演讲,并屡次受到包括总统在内的许多政要的“接见”。

其十,组建武装,袭扰我边境。

1958年,“藏独”势力纠结3000人成立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发动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残部逃亡印度。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为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包抄,袭扰中国的后方,由CIA牵头在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地区重建了反攻西藏的“卫教军”。在其后的十多年间,CIA不仅提供经费、装备和武器,并参与训练、指挥。“卫教军”长期侵扰我边境与驻藏部队的运输车辆。1974年,“四水六岗卫教军”已被尼泊尔政府军歼灭。除了“卫教军”外,西藏分裂势力还有一个叛乱武装力量——“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该武装是于1962

年 11 月 14 日,在印度与 CIA 的支持下建立的。印度在挑起中印边界战争失败后,为应对将来可能的对华战事而组建了该部队,以便战事发生时对我国边境进行渗透、破坏、侦察、偷袭与游击战等活动。

“流亡政府”这几十年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基本上就是围绕上述策略来开展的。这些活动迎合了西方一些企图遏制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需要,双方密切“互动”,各取所需。客观上而言,这些分裂活动的确混淆了国际视听,抹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对此,法国记者兼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有过较深刻的揭示。他曾于 2010 年赴西藏采访。在当地,他亲眼见到了被西方媒体长期有意过滤掉的事实:西藏地方媒体都使用藏语,藏族文化成为大学的单独课程或学科,自然环境保护得力。经过一年的独立调查,他在《并非如此“禅”:达赖隐匿的另一面》一书中总结道:绝大多数西方人并不了解西藏的实际情况,也不了解达赖喇嘛隐匿的真实面。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亦有同感:“我们完全被这位想通过祈祷和微笑改变世界的老人所征服,在他面前放弃批评性考。……如果我们在西藏问题上只看到达赖喇嘛的微笑,那么这就说明我们看重的是西藏问题给我们带来的象征意义,而不是西藏本身。”

其实,“流亡政府”内已有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在从事“一项没有希望的事业”。对于“藏独”活动,藏族的哲理格言诗集《萨迦格言》有个极好的注脚:“终究办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妄想;消化不了的食物,不要去贪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的日益增多,包括西藏政治流亡者在内的各种分裂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将日益缩小,其最终的结局将注定淡出历史的舞台,为正义的人们所抛弃。

[参考文献]

- [1]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问. 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10-16(5).
- [2] 益 多. 十四世达赖言行评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8-129.
- [3] 曾晓阳,李冬莲. 浅析国际援藏 NGO 的活动与影响[J]. 人民论坛,2012(35):254-255.
- [4] 张文木. 印度的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问题[J]. 战略与管理,1998(5):105-109.
- [5] 孙 茹. 人权观察[J]. 国际资料信息,2003(2):38-39.
- [6] Donald J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207.
- [7]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中美战略关系新论[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466.
- [8]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2003,5(3):78-79.

(责任编辑 文 格)

On the International Living Space Tactics of Tibetan Exiled Government

ZENG Xiao-yang, MAO 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3,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Tibetan exiled government, as an exiled political force without any government's official recognition, has been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with all sorts of means to show its international existence from 1959. We should fully disclose these tactics so that we can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plans.

Key words: Tibetan exiled government; living space; tactics